

叶利钦自传

1275

東方出版社

Б.ЕЛИЦИН
ИСПОВЕД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КИТИС» 1990Г
根据苏联拉脱亚《РУКИТИС》出版社1990年版译出

叶利钦自传

YELIQIN ZIZHUAN

著者/[苏]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朱启会 荣 合

何 樵 辛 力

封面设计/郭振华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87,000

版次/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10-8/K·51 定价 3.85 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原名为《我的自白》，是苏联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写的自述，1990年4月在苏联出版。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6月生。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1955年起任总工程师、建设局局长等职。1961年入党。1968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部长、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年11月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任命为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1989年3月当选为人民代表。1990年1月他组成了苏共“民主纲领派”。5月29日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7月12日，在苏共28大会上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作者在书中系统、全面地叙述了他的生活道路。特别是他在政治上几经沉浮的经历。为了供党、政、军领导同志及有关人员了解研究苏联情况，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

同时，我们还编译了叶利钦近期的主要言论和活动资料，作为本书的附录，供研究查考。

1990年10月

作 者 的 话

最近两年，有几家大出版社建议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生平的书，我拒绝了。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来写这样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另外，我还认为现在还不到作总结的时候。

然而国内生活在继续发展。几个月和几个星期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狂风暴雨般的戏剧性事件。这在过去起码要过几十年才会出现。我们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已告别了我相信永远也不可能复返的那个时代。某个时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时代也许在我的回忆录里会有意义。因此，在他们一再坚持下，我同意写一本书，既写自己，也写过去我所经历过的时代。

但正象我预料的那样，写书的事基本上是在星期天和夜间进行的。如果没有年轻能干的女记者瓦莲金娜·尤马舍娃的帮助，很难说能写出这本书。她经常来我这儿，协调和安排我的工作；节假日不休息，夜晚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瓦莲金娜·兰采娃、列夫·苏哈诺夫、塔吉娅娜竭诚友好地帮了很多忙。当然，也包括我的家庭。我还要感谢利季娅·阿列克谢耶娃，她通过打网球帮我经常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我对所有这些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命运使我能和他们在一起。

我想把这本书的稿酬捐助给我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我们的医院由于缺少一次性注射器和其他设备，从而发生了儿童感染上艾滋病这样悲惨的事件。我认为我有义务在防止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斗争中，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稿酬将用于购置一次性注射器和其他必要的设备。如果这对人有所帮助的话，我将感到幸福。

斯里鲍·叶利钦

目 录

序 言..... (1)

我的自白..... (3)

附 录 叶利钦的言论与活动.....(223)

(1989年5月—1990年8月)

序 言

这部书还没有结束

对于你，读者来说，主要的东西还在前面。

因为这部书并没有结束，其中描述的事情还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它的主人公及作者——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也都还活着，那些信任他和仇恨他的人也都在。总之，书中描写的事情还在继续。

但尽管如此，我也羡慕你，读者：我已经读了一个将改革搞得轰轰烈烈的人物的自述。而这个人曾是一个平凡的党组织里的一只令人生厌的“丑小鸭”，但在最困难的时刻他却是一名斗士。这些你在书中都会看到的。你会知道，围绕叶利钦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不易和令人揪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多么荒唐，你会从这位人物的口中得知这一切，因为你读到的“自述”是一位充满血肉的人的自述。

从童年的乌拉尔陈旧的工棚到克里姆林宫——就是这本回忆录所涉及的范围。他从疑虑到作出决定，取决于我们大家都拥有的这个现实世界以及这个人的思想，他走到了那个作出震撼世界决定的至高无上的地方。我们的党使自己上升到了权力的巅峰，变成了巨人，但她却没有听到人民强健的呼吸声，而人民却什么都看在眼里，明在心头。

我的老同事、记者亚历山大·奥尔比克是在1988年在尤尔马拉认识叶利钦的，当时他正不得志。奥尔比克打电话到

我的编辑部，问我：

“萨沙，你登不登采访？”

“登。”我回答说。

我们闯过重重关口，终于将这篇采访记发表出来，当时，有关叶利钦的采访记还是第一次在苏联发表。没过多久，《苏维埃青年》报上的这篇采访便在全国的140家报纸上予以转载。当时，叶利钦在读者面前就象一只钟一样颤颤悠悠的，但反响很好。

我不想在此将叶利钦说得天花乱坠并公开表白我对他的爱。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且，我们已经挣脱了奴颜卑膝和甜言蜜语的羁绊。我只是想告诉读者，你看看这本“自述”吧，你看后也许会明白，一个人命中注定的生活天地即使再狭小，他也应该去拼搏和奋斗。

《苏维埃青年》报主编

亚历山大·布里诺夫

我的自白

1989年3月25日

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纪事

似乎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明天就要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莫斯科第一民族地域选举区推举我和布拉科夫为代表候选人。绝大部分莫斯科选民（600万人）都将选举我为他们的人民代表。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民意测验，以及美国人的预测，都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选举前的气氛也看得出来，并且，我的直觉本身告诉我：明天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

只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睡不着。所有在近几个月、几周和近几天中发生的一切，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认真地思索，哪些事我做错了，哪些事我做对了。我作过错事，但我感谢这些错误，因为正是它们提醒我要谨慎从事，并逼迫我更加拚命地工作。

总的来说，这就是我的性格。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是好，还是坏。我在分析情况时，总是看不见那些成功的东西，只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缺点及失误上。因此，我总是不满意自己，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都是如此。

明天人们就将要对我近一年半来的生活作出结论。我叶利钦是个政治的弃儿，曾作过响当当的党的高官，只不过如今在这些官阶前面都要加上“前”这一前缀，“前”苏共中央书记、“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前”政治局候补委员……都

是带“前”字的。对待过去的政治活动家，斯大林时期是大肆杀害；赫鲁晓夫是让他们退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把他们派往遥远的国家当大使。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也是史无前例的，退休军人曾得到重新返回政治生活的机会。

当我被解除了全部职务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并建议我任苏联建设委员会主席。我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此时无论在哪儿工作，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戈尔巴乔夫在谈话结束时对我说：“但你要注意，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的。”那时，他大概真的相信情况果真会是这样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制造和启动了民主化进程的机制。这一机制使总书记的话已不再是必须立即绝对服从的“圣旨”。现在我们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我不让你搞政治”，但人们却会转而一想并作出决定：“不，应该让他去搞。”于是，就真的让你去搞了。时代已经变了。

真不知这个时代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东西！新时代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但是，它的灾祸也正在于此。谁也不清楚，前面有什么，也不清楚，我们今天迈进的步伐明天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党内官僚机构那笨拙、庞大和愚蠢的身躯艰难地挪动着，企图守住阵脚，但是，这却使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加快了自己灭亡的速度。

有些人需要做的事其实并不牵涉全局，不算十分复杂。他只要在选举中将我击败就行了。这件小小的事情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这又不是要在2000年以前让每一户家庭都住上房子，也不是要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到使全国人民能象真正的人一样，吃饱饭、穿好衣。这只不过是对付一个人而已……并且，他们手中还有美妙的“选举法”，可召集选区选民会议并在会上淘汰掉那些不合适的人选，掌握有选举委员会这个

官僚主义产物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此外，他们还将庞大、顺从的官僚宣传机器攥在手里，需要什么，这个机器就会给你造出什么。但尽管如此，他们最终还是枉费心机。近几个月来，他们对我发动了多少攻势，捏造事实、造谣中伤、中央全会作出严厉的决议来反对我，还要弄其它的花招，可这些都破产了，相反，还使我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反对我的行动屡遭破产，这些行动激起了莫斯科群众对我的爱戴。每当这时，我便特别清楚地感到，我们的面前横着一条多么巨大的深渊，并且要想跳出这个深渊，我们不知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要准备在改革和公开性的道路上采取新的变革措施的，正是党的这一机构和这些人，而且他们的这一权利谁也不给。在这种时刻，你简直是无可奈何。

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同我的选民们见面。我从他们的身上吸取力量，并萌发了新的信念：我们将再不会，也不能象从前那样生活了。我们在道德上受奴役的地位从此将会一去不复返。

好了，不多想了。但要是我明天落选了怎么办？这将意味着什么？难道那个机构的力量更加强大，难道说非正义将要占上风？唉，哪能呢！只不过，我也是一个凡人，我也有缺点，性格复杂、固执。我曾经常犯糊涂，常做错事，因此，我如当选不上也完全是可能的。但如果布拉科夫真的当选，他是那个机构下的赌注，他也未必会真的就俯首贴耳地顺从那些推举他的人的意志。在今天的形势下，无论是他，还是我，以及还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只要他听的是人民的话，而不是那个官僚机构的话；只要他是在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在为党的官僚机构卖命，他都可以作人民的代表。

不过，我还是相信，莫斯科的市民们是会投我一票的。

选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如果再回到1987年10月，您还会那样做吗？”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在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发言是否是您绝望的表示，或者说，您是否希望以此得到当时政治局成员中哪位成员的支持？”

（选自叶利钦在参加会见、群众集会及会议时莫斯科人的提问——作者）

政治局会议结束了。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张干净的纸，再次想了想，将纸摊开，提笔写起来：

尊敬的戈尔巴乔夫：

我不是随随便便就决定给您写这封信的，我为此想了很长时间。自从您和政治局决定让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我同意担任这一职务起，已经过去一年零九个月了。当时，我为什么同意，或者是为什么拒绝，这些理由显然都已失去任何意义。我当时只是明白，我将遇到很多困难，知道我还需在自己现有不足的经验上补充许多新的东西。

不过，尽管如此，所有这些都没使我产生畏难情绪。我觉得我有您的支持，因此，我当时产生了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哪来的信心，并开始忘我地、同志式地同新的市委成员们一起开展工作，并在工作中注意坚持原则性和集体领导制原则。

第一阶段过去了。当然也做了不少事情，我不想在此一一列举。但是，我以为，主要的成绩是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精神面貌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当然，总的说来，这也是在全国

这个大的形势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尽管如此，我的不满感却与日俱增，虽然说起来，这好象十分奇怪。我开始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和语言中发现一些从前尚未发现的东西。从前，他们关心和支持我们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现在这已被一种冷漠所取代，特别是个别政治局成员更是如此。

我这个人总是憋不住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在我的看法同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越来越多我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如果准确地讲，像我自己那样的风格、直率的性格和阅历在政治局中已经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

在此，我不能不同您谈谈几个相当有原则性的问题。

我要谈的一些问题，包括干部问题，我曾经对您说过，也给您写过信。我现在谈的是补充意见。

有关利加乔夫工作的风格问题。我，包括别人也认为，他的工作风格对工作已经不合适，在现在的条件下尤其如此。我并不想在此贬低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利加乔夫的风格变成了中央书记处的风格，并且个别地方党委会的书记也不分情况就照搬照抄这一风格。主要的是，我们全党成了这一风格的受害者。若将这一切当众戳穿，党将遭受损失。从党的利益来讲，只有您本人才能作些改变。

在社会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党组织落在了后面，在这方面实际上没有进行什么改革（大的政策除外）。所有一切便由此而生。结果是，当我们看到改革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受阻时，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不解。

我们的设想和提出的主张是革命性的。而对其实施在党内却还是采取从前那种地区狭隘主义、谨小慎微、官僚主义

态度以及表面上看来气势宏伟的态度。革命性的主张同远离政治态度的党的行动之间产生差距的根源就在于此。

文件堆积如山(你想想,天天在那儿盘算收多少西红柿、茶叶,有多少车厢,这能有什么结果呢?)、会议没完没了,都是些小问题,总是吹毛求疵,为整材料到处挑毛病。只管自己的声望。至于说下面的批评,那就更是谈不上了。许多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是却不敢说出来。这种状况令人担忧。我觉得,对于党来说,这是最危险的。总的来说,利加乔夫缺乏一整套工作办法和工作艺术。他总是拿他在托木斯克州工作的经验来搪塞。这已经不合适了。

他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以后和9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我发起的攻击,我只能说,是一种精心调配的毒剂。莫斯科市执委会作出的有关游行示威的决定属于莫斯科市本身决定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我不明白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委员会有什么作用^①,并请求您挽救已经形成的局势。可以看出,利加乔夫不是在协调党的机制,而是在使这一机制变得更加混乱。我不想谈他对我们莫斯科的态度,两年之中,他甚至连一次也没有过问过有着115万党员的莫斯科市党组织的事情,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莫斯科市党的基层党委会丧失了自主权,而与此同时集体农庄和企业却有这种自主权。

我一贯赞成要严格要求、对错误要进行认真的追究。但是,我却不赞成制造一种令人感到畏惧的气氛。党中央和基层党委之间缺乏始终一贯的原则性立场和党的同志式的气

^① 利加乔夫在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在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莫斯科市事务的委员会。——作者注

氛。而只有在这种同志式的气氛中才能产生创造性精神、信念及进行忘我的工作。我认为，产生所谓党内“阻碍机制”的原因就在于此。应当大力裁减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裁减50%），并且坚决地变革党的机构。虽然这方面我们积累的经验还不多，但莫斯科基层党委员会的工作还是证明了这样做是有益的。

中央政治局成员中某些人的态度使我感到压抑。这些人头脑机灵、会很快“见风使舵”。但难道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们吗？这些人好用，而且恕我冒昧直言，他们对于您来说也是好用的。我觉得，有一种人，即使对什么问题有意见也总是喜欢缄默不言，因为，有人已开始利用“赞同”来做政治游戏。

我是一个不好用的人，我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最好是现在就承认错误，否则，在今天的干部状况下，与我有关的问题将会增多，并将妨碍您的工作。而我从内心讲是极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之所以不愿意，还因为争取稳定的斗争导致了停滞，导致出现了这种，准确地说，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您也确实作出了努力，但出现这个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几个原因和动机。这并不是什么软弱和胆怯的表现。

我请求解除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我请您将此看作是我正式的辞职申请。我想，我将没有必要再向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这一问题了。

顺致敬意！

鲍·叶利钦

1987年9月12日

我将信装入信封，最后想了想，是否有必要将这封信发出，或许最好是再等一等？……随后，我毅然决然地打消了所有这些补救的念头。我叫来助手，把信交给他。我非常清楚，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的休养地皮聪达别墅之间保持着畅通无阻的通讯联络。几小时以后，戈尔巴乔夫就会看到这封信的。

他收到信后又会怎么办呢？……是把我叫去？还是打个电话，让我别激动，继续像从前那样工作？或许，我这封信会帮助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党最高层中的情况已经糟糕透顶，应当迅速采取措施，使政治局中的情况恢复健康和生机？……

我收回紊乱的思绪。桥已烧毁，我已无路可退。我还像平常一样，从大清早工作到深夜，连我自己内心都承认，我很激动，心里不好受。可我外表却装出一副似乎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都没有发现我的反常现象。

这场戏就这样开场了。戏的结局是满城街谈巷议，并于1987年10月召开了党中央十月全会。这次全会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平常的，大概我的生活就是如此。

后来，经常有人问我，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有什么具体的动机。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没有。”也的确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似乎是逐渐慢慢演变而成的，谁都觉察不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我在这次会上就这个报告提了近20条意见。总书记听后火冒三丈。我记得，当时我感到非常气愤。怎么可以用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对待批评呢？我简直感到震

惊。但不管怎样，这次会上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的动因。

这一切还是在我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时刻起就开始的。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些怪，准确地讲，是这些人中间的怪人。我认为，我不能对自己不明白的东西“随波逐流”，并且我感到，在这儿人们都已习惯追随一个人做事和思维，这个人就是总书记。在这个所谓集体的党的机构里，人们几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说，即使发表，也只是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些同会议主席意见不一致的看法。这被称作是政治局的一致性。而我呢，就从不将心里的东西用纸包起来，并且，自从开始在政治局工作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没想要改变自己。这一点触犯了他们，引起众怒，使我同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以及其他的政治局成员都发生过冲突。有些人在内心里支持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情我，但是，表面上却看不出来。

同政治局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进行斗争，这一想法在我的心中由来已久。这些作风及方法同戈尔巴乔夫1985年倡导的有关改革的号召实在是“南辕北辙”。当然，现在的政治局已经不像勃列日涅夫时的政治局了。现在，政治局开会时大家一坐就是半天，并且常常是听会议主席的“独白”。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说话喜欢绕圈子，喜欢夸夸其谈，有开篇，有结尾，几乎每说一句话就要作一番解释。会上似乎也有讨论的气氛，与会者好像也都发言。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总书记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每一个人又都支持这种游戏，并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都非常出色。可我却不愿意加入这场游戏中去。因此，我的发言总是犀利、直率。老实说，我作的那些发言